

重庆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一月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十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0.80 元

深切悼念田伯萍同志

踏 莎 行

悼念田伯萍同志

熊 复

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伯萍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不胜伤痛。因作此《踏莎行》，以志悼念。

记得去年，黄花时节。山城一晤成永诀。韶华往事随流水，更从何处向君说。

当时少年，英气勃发。敢追先驱洒热血。山河娇艳看不尽，剩有青史留忠烈。

桂 枝 香

悼念田伯萍同志

陈 野 苹

京华聚首，是浩劫余生，廿年分手。畅叙离情别绪，碰杯飞斗。《新华》《群众》光荣史，为编书，四方奔走。壮志堪仰，沉疴不起，痛伤良友。

忆往昔，联肩战斗。那风雨山城，黑云遮昼。惯使唇枪笔剑，伐顽诛寇。艰难岁月难忘记，又常怀湫水榆柳。过河南下，汉江波滚，渝州思旧。

七 绝

闻伯萍老友之丧

于 刚

热血正气许深知，欲起沉疴恨已迟！

梦醒故人挥手去，小楼寒夜立多时！

深切的悼念

曾 德 林

对于田伯萍同志的逝世，我感到十分悲痛，表示深切的悼念！

从几十年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知伯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勇敢坚定，对待同志坦白诚恳，对工作积极热情，对群众平易近人。

伯萍同志曾经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受委曲而无怨尤，处逆境而益奋进。

伯萍同志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革命斗士！

对伯萍同志的最好悼念是学习他的这种高尚的革命品质。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同志。

挽 联

张 友 渔

在白区宣传革命，甘茹苦辛，挥毫作战；
为祖国努力建设，不辞劳瘁，虽死犹生。

挽 联

石西民 吴 伟

为抗暴，奋椽笔，坚操守，斗横逆，任尔风雪
弥天，巍巍新华留战绩；

历沉冤，怀贞洁，扶病创，注精力，何惜肝脑
涂地，堂堂师表耀山城。

目 录

深切悼念田伯萍同志

.....熊 复 陈野苹 于 刚 曾德林
张友渔 石西民 吴 伟(首页)

“新华军”战士田伯萍

.....林 曦 王匡时 耿俊如 左明德(1)
四十年代的田伯萍同志陈理源 程代勋(5)
田伯萍同志二三事唐弘仁(7)
扬帆鼓浪人姚江屏(10)
最后的时刻沈世鸣(13)

毛主席和九三学社许德珩(16)

周总理和李四光徐 盈(21)

忆甘永柏同志方 敬(30)

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冯开文(38)

投入大革命的洪流胡兰畦(44)

第二青春秦德君(118)

军统重庆集中营大事记俞 展(168)

质疑·补充·订正

对《张治中三到延安》的两点订正余湛邦(219)
《重庆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至二十辑目录索引
.....(220)

“新华军”战士田伯萍

林 曦 王匡时 耿俊如 左明德

冷酷病魔夺去了田伯萍同志的生命，我们的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忠诚战士。当年我们在《新华日报》并肩战斗过的同志又失去了一位战友。记忆的闸门被突来的噩耗冲开，一桩桩激动人心的往事涌进我们心里……

田伯萍同志早在调到《新华日报》之前，就是一名久经锻炼的革命者。青年时代他就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一九三六年二月入党后，先后在上海、延安、贵州积极从事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活动。

一九四六年初，田伯萍同志由组织调到《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直到一九四七年初撤回延安。他在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曾因工作积极，由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电请中央予以奖励。

在《新华日报》工作期间，田伯萍同志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勇敢。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报纸《新华时报》，公开把他和邵子南同志污蔑为“放火队长”。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为挑动内战，在重庆连续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事件。田伯萍同志每次都到现场采访，直接参加斗争。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特务教唆一个青年，叫他到《新华日报》宿舍“星庐”来自杀，妄图嫁祸《新华日报》。伯萍同志遵照吴玉章同志指示，及时赶赴现场采写了报道，戳穿了特务的阴谋，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解放后，从国民党特务的档案中发现，伯萍同志被敌

人列为准备重点迫害的对象之一。这从反面证明了田伯萍同志当年在斗争中的英勇顽强。

田伯萍同志在《新华日报》任记者时，善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一九四六年底，“沈崇事件”发生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以记者身份深入学校，发动师生，在中共四川省委青年组、妇女组和《新华日报》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全市发动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抗暴学生运动。在声势浩大的“一·六”抗暴大游行中，田伯萍同志勇敢地走在队伍的前列。反动分子向他扔石头，打坏了他的眼镜，但他仍然英勇地和师生团结战斗在一起，田伯萍同志还经常深入工人、贫民群众，为人民发出正义的呼喊。大渡口钢厂罢工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伯萍同志便团结《新民报》等几家友报的七、八位记者一同去采访，分工加以报道，揭露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动员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支援工人的革命斗争。一九四六年八月，重庆有几千失业军官，在邵子南和田伯萍同志的发动下，大批国民党失业军官组织起来请愿，喊出了“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口号。

田伯萍同志在《新华日报》的采访工作中，遵照党组织“勤交友”的指示，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六年，《新民报》失火，损失很大。《中央日报》只假惺惺说空话表示“慰问”，而于刚同志当晚代表《新华日报》，和几个同志专程从化龙桥赶去慰问，还送了许多生活用品；田伯萍同志第二天亲到失火现场采访，五日的《新华日报》以醒目的地位刊载了他采写的稿件，标题为：“大田湾前夜起大火，《新民报》损失很重，历年存储资料完全化为灰烬，该社正积极努力复兴中。”《新华日报》的关怀和支持，使《新民报》许多人都感动得掉泪。

那时，《新华日报》和许多友报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有些新闻在友报不能发，就拿到《新华日报》来发。同样，有些新闻在《新华日报》上不便发，又交给友报去发。一些不敢接待《新

华日报》记者的地方，田伯萍同志便约友报记者一起，用他们的名片去采访，搞得十分成功。在抗暴爱国学生运动中，有一次刊登声援学生的宣言，各报公开签名的记者就有七十六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封闭《新华日报》，报社人员被武装押送到化龙桥集中，随时有牺牲的危险。这时，报社领导传达了吴老的指示，激励同志们坚持革命气节。田伯萍等同志在敌人的枪口和刺刀威逼之下，临危不惧，带头抗议，声讨敌人，坚持斗争。撤回延安时，根据上级指示，要带全套《新华日报》合订本回延安。国民党反动派突然下令，不准带走。田伯萍等同志针锋相对，据理力争，驳得敌人哑口无言，终于把全套合订本带回延安，为党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无产阶级新闻资料，这就是解放后发行的《新华日报》影印本的底本。

撤回老区后，田伯萍同志先后任过《晋绥日报》记者，陕西两郿地委干校副校长，经历了土改、行军的锻炼和陕南游击区战火的洗礼。一九四九年，他随着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胜利地重返山城。建国后，田伯萍同志始终从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五十年代后期，他长期遭到冤屈。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更屡遭迫害，身心备受摧残，但他革命的意志十分坚定。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在市委领导下，顶住“左”和右的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政策，大胆起用人才，积极为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田伯萍同志是“新华军”的一个老战士，近年来，积极致力于整理《新华日报》史，并且是《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的积极发起者之一。一九八〇年在他被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期间，就与其他同志一道，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访问了许多参加过两报刊工作的同志，发动大家写作，经过共同努力，《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总会

终于去年三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此时，田伯萍同志尽管已身患重病，刚动过手术，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日夜工作。由于他的大力推动，重庆在全国各地中最早成立了分会，并且团结《新华日报》当年的支持者、老朋友和一批热心研究《新华日报》史的中年同志参加这项工作。

田伯萍同志关心党的事业，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时时关心着工作，去年十月，他第四次动手术，一下来就马上过问工作。每当有干部去看望他时，他总是关心同志们的疾苦，还一心挂着同志们的住房问题、子女问题甚至转正问题，并一一请别的同志去把这些事办好。他在病危之际，还在关心着《重庆谈判纪实》一书的出版、发行和宣传。大家望着他那消瘦的面庞，听着他那吃力的叮嘱，都忍不住潜然泪下。

田伯萍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好党员、好干部和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精神，学习他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总路线、总目标，为开创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

四十年代的田伯萍同志

陈理源 程代勋

田伯萍同志早在解放前十多年的黑暗岁月里，中国人民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时，为了寻找光明与真理，不远千山万水和人间妖魔的阻拦，由国统区奔赴延安。学习告一段落后，他便带着历史的使命，回到云贵高原的故里，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在白色恐怖中，从事散播革命火种的地下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捕杀共产党人。田伯萍同志遵循党的指示，赶往贵州西疆工作，让其他同志首先撤离，最后他才转移到重庆，经有关同志介绍到《新民报》担任资料室主任，这是田伯萍同志从事新闻事业的开端。

时仅数月，田伯萍同志又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和其他同志偕往西北，踏入荒漠，到甘肃油矿局去，以职工子弟小学的教学职业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荒漠的生活条件比重庆艰苦，但田伯萍同志和同志们在那里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直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才从沙漠滩回到重庆。

一九四四年，日寇利用蒋介石一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和腐败无能，发动了所谓“打通大陆”之战，席卷湘桂，直扑贵州；使“陪都”重庆大为震动，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决定在日寇侵占贵州这一战略要地时，在该省建立敌后武装根据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王若飞同志受命领导这项工作，责成张立同志拟订初步计划，带领一批干部赴黔，准备组织贵州人民打游击战。那时田伯萍同志

被派作先锋队，于国民党兵荒马乱、川黔交通梗阻之际，星夜驰赴贵州，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各地有关同志传达党的指示和决策。后来这个计划虽因局势变化而未付诸执行，但田伯萍同志仆仆风尘，奔走在云贵高原，忠诚执行了党的使命，我们至今思之，其情景犹历历在目。

一九四六年一月，党派伯萍同志到《新华日报》作记者，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回延安。在这个历史时期，伯萍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吴玉章同志、潘梓年同志等人的领导下，作为邵子南同志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在新闻采写、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党对新闻界的统战工作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今，我们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重庆国民党官方举行追悼军统头子戴笠的大会，伯萍同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观察，就座不久，“追悼仪式”开始，主持追悼会者高呼“全体肃立”向戴笠“致哀”，邻座的一位友报记者，一时感到不好应付，勉强欠身起来时，田伯萍同志敏锐果决地将他的衣襟往下一拉，让他象自己一样昂然坐着，在这种对中国希姆莱顶礼膜拜的情况下，在虎狼的环伺之中，田伯萍同志始终保持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凛然正气，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高风亮节。

.....

解放后的三十多年间，在党的领导下伯萍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心竭力地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癌症已经严重威胁着他的生命时，伯萍同志还壮心不已，竭力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念念不忘振兴中华的大业，可惜，伯萍同志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伯萍同志虽然去了，但他战斗的一生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良品德，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田伯萍同志二三事

唐弘仁

自从接到田伯萍同志的讣告以后，这些天，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不能抑制自己内心的悲痛、哀伤。去年十一月底参加了“中美合作所”殉难烈士三十四周年悼念活动之后，我曾先后两次去医院看望他，他用力撑持住衰弱的身躯，和我交谈约半个小时。他病情如此严重，身体如此虚弱，但在交谈中反而还关心在北京，在贵州的老朋友、老同志，还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他当时的音容、语态，历历如在眼前。这些天，我回想起他革命的一生，他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对敌斗争的坚决立场，他对朋友、对同志的平易近人，谦和朴实的优良品德，以及他在处理个人与党组织与集体的政治组织原则，种种事实都不断地在我心中萦绕，引起我无限的怀念和钦佩。

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报》工作，我们一道采访消息和新闻的时候很多。使我难忘的是有次和他一道去采访戴笠的追悼会的新闻。戴笠是蒋介石所豢养的特务头子，他从飞机上摔死以后，重庆市的国民党组织发起了一次追悼会。通知了许多报馆记者去参加，我和田伯萍同志当时都是记者，也和许多报纸的同行一道去了。我们的任务是了解情况，采访新闻，而不是去参加悼念。悼念会开始以后，会场上奏起哀乐，司仪宣布起立默哀，田伯萍却安坐不动。在他的启迪下，我也同样没有起立默哀。不料这样一个细节被特务注意了，专对我们偷拍了一张

照片。追悼会结束后，刚一走出会场我便把特务拍照的事告诉了他。田伯萍同志气愤的说：“让他们拍吧！杀死了我们多少同志，关了我们多少人啊！我们还要起立为他默哀！”

后来，一些同行和同志议论过这件事，认为不站起来默哀是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在那种公开集体场合，随同大家起立了也是可以的。这样一件小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反映很强烈。田伯萍同志讲话时的那种凛然正气和他当时眼睛里喷射出来仇恨的火焰，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人把一个记者去参加这样的追悼会，认为是立场问题，是气节问题，甚至把它说成是参加反革命活动。我根据田伯萍同志这一行动，进行了驳斥；同时也表达了我对伯萍同志的崇敬的心情。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和党派也在这里公开活动。有个时期民主运动十分活跃，国民党的特务、暗探也特别多。这些特务、暗探时常采取盯梢、监视等卑鄙手段进行破坏。当时作为《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外出采访，它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一场公开与隐蔽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当时我不仅从田伯萍同志的言行中认识了他对革命工作的坚定立场和乐观态度，也从他那里受到了许多教益。这种例子相当多，我这里只讲一个。有一次我和邵子南、田伯萍同志一道去半山新村拜访一位民主人士。时间是在夜晚，地点又较偏僻。走到半路，邵子南同志突然问我：“和我们一道，深夜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采访新闻，你怕不怕？”因问题提得很突然，我马上回答：“时间还这么早，又是公开活动，怕什么？而且和你们一道，我更不怕！”伯萍同志马上说：“不对！和《新华日报》记者一道走，要担风险，有的人还是怕的。因为我们是特务暗探盯梢和打击的对象，随时都有危险。我们出去活动，有时地点远一些，事先总是与机关组织有预约，明确几点钟回来，如过时不回来，便可能出了事。所以，我们出了门，随时要作出回不来的准备。（邵子南插话：“作出牺

牲的准备。”)搞革命活动，随时随地都要有作出牺牲准备。”这件事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都记得。我在红岩村向党宣誓时，想起了田伯萍、邵子南同志讲的那几句话。以后，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也时常想起了他们讲的那几句话。

田伯萍同志十分关心党内同志，注意团结党外朋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肩战斗，去夺取胜利，这类的例子很多，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扬帆鼓浪人

——忆田伯萍同志

姚江屏

我赶到医院，伯萍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已经好一阵了。将近四十年的友谊，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无限遗憾。

青年时代，我们就在一起跑新闻了。他的沉着、机智、朴实、待人热情，一直使我钦佩、难忘。他是一个关心别人甚于关心自己的人。他青年时代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事迹的鼓舞，一九三六年入党。他给人以信念，以力量。他是我的引路人，引导我在新闻战线上当好一名尖兵。一九四六年他从贵州省工委西南路特派员岗位上调来重庆《新华日报》，为时不久，在重庆新闻界进步同业中，就赢得了尊重，好多同行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田”。他光明磊落，身上有一种深蕴不露的力量。

四十年代的重庆新闻界，是进步与反动大对垒的前沿阵地，斗争相当艰苦，一不小心，就有坐牢杀头的危险。他经常关切我，提醒我。有一次我们同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见到我当面讥讽嘲弄一个反动记者，事后即对我晓以利害，讲了斗争的策略，而态度是那样敦厚恭庄。在友谊的温暖中我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又一次，我去劳动协会采访，正碰上特务包围查封劳协。起初特务不知道我是《新民报》记者，误为劳协人员，把我禁锢在劳协大厅里。当他们用花名册逐一查问时，才发现我这个多余的人。驱逐我时，特务再再“告诫”，不准发布新闻。目睹了这场迫害情景，我义愤填膺。如何报导这条重要新闻？报社会不会发表？发表之后我的处境又将如何？首先想到的就是求教于伯萍同志。傍

晚，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大公报》记者张学孔请来，说明原委，由我执笔，《大公报》、《新民报》发“通稿”，伯萍同志设法联系两报编辑，一字不改都以“本报讯”同时见报。在那个时期，强调独家经营，“本报讯”都是由各报自己的记者、通讯员采写的，报社老板最忌讳在不同的报纸上出现一字不差的相同的“本报讯”。第二天，《新民报》负责人见到这条新闻，有些惴惴不安，便向编辑部追根，又找我究底。当我把当天《大公报》这条同样的“本报讯”指给他看了，并告诉他这是为了分担风险之后，这位老报人才微微地粲然笑了。

一九四六年，一部分进步记者筹备庆祝“九一记者节”，伯萍同志一天要奔波好几趟，上坡下坎去《商务日报》碰头。《商务日报》的张孟恢、梁柯平，《民主报》的唐弘仁、李康，都劝他不必这么辛劳，他爽朗地笑笑：“为大家办事就要办好！”可是庆祝记者节那晚，他却那么谦逊地坐在一个角角里。反动派的记者群，以邀游黄山参观蒋介石别墅为名，意在分化新闻界进步阵营，邵子南、田伯萍得知一部分进步记者不吃这个“请”之后，便分头找我们做思想工作，分析了应邀与爽约的利弊得失，并把他的设想筹划耐心地向我们一一说明。于是大家欢欢喜喜地参加了这一“盛举”，结果是用了他们的车，吃了他们的点心，我们游我们的山，逛我们的庙，还吸引了不少中间力量到我们这一边来。事后，大家谈论，都发出会心的胜利微笑。通过这一次活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新闻战线上的具体运用。在抗议中央社颠倒黑白，歪曲较场口血案当中，新闻界发动了两次签名，第一次签名者四十余人，第二次扩大到二百二十一人，主要也是由于伯萍同志的奔走、说服，既壮大了声势，又争取了中间力量，也保护了进步力量。

他不仅是一位好党员，更是一位勤奋刻苦的新闻工作者。当年的《新华日报》的记者生活非常艰苦，伯萍同志跑新闻、记